

赤裸對話 – 「天若有情 – 保育開平碉樓」

The Remarkable People Naked Dialogue - Gotta be Kind

世界文化遺產「開平碉樓」保育領袖譚金花 X 藝穗會創辦人謝俊興

日期：2017年7月8日（六）

時間：下午3:30 – 下午5時

地點：樓上劇場

2002年，她隻身赴美求學，活用了在各個城市搜集的華僑歷史和碉樓故事，用了8年時間與團隊促成「開平碉樓與村落」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及後經過10年推展「倉東計劃」，讓「文化保育」與「社區營造」在倉東村生根發芽。

她就是譚金花。

從一次攝影習作，譚金花對開平碉樓的故事產生興趣，從而花了兩年時間到美國做研究，回到中國後又在開平碉樓的申遺辦公室工作8年，之後又投身倉東計劃，結下與文化遺產保育的種種因緣。

「開平碉樓能夠成為世界文化遺產，不是因為其建築價值，而是建築與世界的關係。這些建築不只是防禦性的碉樓，對這條村的村民來說，碉樓是一處避難的地方。村莊、碉樓、華僑回鄉所建的學校、圖書館等，加起來才反映到碉樓的主人對家鄉及世界的貢獻。」

謝俊興 (B) ; 譚金花 (T) ; Catherine Liu (C)

B：其實我與金花已認識9年，想起她，就想起這個名字，「天若有情，人亦老」。牛奶公司於1913年12月開張，而我們就在1983年12月拿到這裡的鎖匙，我歸咎或歸功於緣份，一如與金花相識。

我去開平碉樓，是一個很偶然的決定。有兩個藝術家朋友在珠海北師大創立傳理系。有一次那裡舉行會議，我就去探望他們。他們跟我說附近有一條邊界，走過了就像跌進時間錦囊：綠油油的農田旁，有千多間荒廢的房屋。他們說，可以去那裡做一些裝置作品、表演，甚至把整個地方變成一個藝術作品。我立即想到，下次來這裡的時候，吃完飯便去看一看。結果，並不如我想像般，原來要乘車才到達。從珠海過去要多久？

T：兩小時。

B：第一次去，感受很深。於是，我們在城市中舉辦「spotlight hiking」，找了專門研究消失中村落的澳洲攝影家Michael Coyne拍攝這些碉樓。當時我們有一個實習生叫陳燕冰，她的家鄉與開平碉樓距離一小時車程，我就叫阿冰帶Michael到那裡住三星期，感受當地的生活、參加婚禮和宴會等。大約那段時間，我就認識金花。Michael拍攝了很多照片，一部分的照片收錄在他的著作。另一個計劃，我們就把收集得來的故事搬上舞台，找來杜國威作導師，教導年輕的編劇家寫劇本，以話劇呈現故事。8個短劇，都是關於碉樓的故事。碉樓背後的故事很感人，原本當地人到外國謀生，以為到美國掘金，後來才知道是建設鐵路，那是十分艱苦的工作。建完鐵路，他們打算留在美國定居，卻出現了排華浪潮。接下來經濟蕭條，他們便回鄉，回鄉當然要衣錦還鄉建大屋，但不久之

後，生活又再艱難，他們又要離開，留下了這些碉樓。

金花，就是碉樓的守護人，「天若有情，天亦老」，出自唐朝李賀〈金銅仙人辭漢歌〉。這句金句，很多人對下聯，直到明代才有一個蠻老土又好酒的詩人石曼卿對出「月圓無恨，月常圓」的絕句。

「天若有情」，除了可以形容金花所做的事，更反映保育並不是近20年來才在香港興起的事，而是一直以來我們都將文學、詩句、情懷，或文化保育中一些無形的事物，一直承傳下去。

C：交給金花，向我們詳細地介紹開平碉樓和倉東計劃。

T：我在華南師範大學外語系就讀時，報讀了攝影課程。有一次回到開平，就去開平碉樓拍攝。拍攝時，我才知道這些碉樓百分之九十九是空置的。我到處打聽本來的屋主去了那裡，卻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。後來，因為我記得廣州暨南大學有關於華僑歷史的研究，我也去那裡詢問，才發現原來他們沒有人研究碉樓，也沒有人研究北美華僑。

我很喜歡畫畫，就讀華師大外語系時，依然很想讀藝術，但報考廣州美術學院失敗。隨後，我去了美國。到美國後，我依然好奇開平碉樓的故事，於是到華僑領事館，希望了解那些故事。為何有人回到開平建屋？為何後來又走了？為何這些房屋不是傳統風格而是這種風格？

我投入了2年時間翻查有關開平碉樓的歷史，整個過程讓我感觸很大。在我之前，從沒有一個來自四邑或五邑的人到美國研究開平碉樓歷史，所以我遇到的每一個受訪者都很熱心幫忙。有些人駕車到我的大學，有些人從小鎮駕車到唐人街或市中心找我，都帶來我需要的資料。其中一個人叫Peter Soo，他是1935年前洛杉磯中國城舊面貌的設計師，帶來一箱箱的資料。那時我用正片及slide不停翻拍資料，突然抬起頭來，才知道自己由早上10時拍至下午4時。我覺得很抱歉，耽誤了他那麼長的時間，但他卻很有耐性，還說自己已退休，有的是時間。

雖然，80年代有很多人到美國讀歷史，但他們只懂中文也看不明白早期以四邑話寫的文獻。我們採訪了很多故事，這個歷史事件，我是從被訪者的經驗而讀懂的。幾乎每一個被訪者接受訪問時也會落淚，因為他們提到當時在美國被人看不起，他們花費大量金錢回鄉建屋，但建完的房屋又沒有機會住下來，時勢所迫再離鄉別井討生活，很悲慘。那個過程讓我明白建築的重要性，有些歷史是看不見的，只能從物件或建築物中去了解。因此，建築是社會發展史一個有效的見證，所有人都可以看到。

從美國讀完書回來中國，當時開平碉樓申請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，叫我做翻譯。我說我沒有能力擔任翻譯，因為我不懂得建築，很多事情也不會做。後來，我去了香港大學建築保育學部就讀，之後就開始了解建築的世界。

參加開平碉樓的申遺工作是一段很好的回憶。我是一個喜歡自由的人，專做讓自己感覺自由和快樂的事。開平碉樓申遺的支援未及其他省份的項目，廣東省只資助三千五百萬，其實遠遠不足。而且，我們沒有來自北京的支持，北京的專家指碉樓由華僑所建，歷史意義不大，對他們來說一兩百年根本沒有歷史的厚度；農民建的碉樓，柱式不合標準，好像四不像。

2年時間的美國採訪，我深深地感受到建築與人的關係。開平碉樓之所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，不因歷史的長短，不因建築設計是否合乎西方標準，而是具有普世價值，建築見證了世界的發展。

C：你之前提到申遺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，你們後來有調整到少許角度。

T：開平碉樓能夠成為世界文化遺產，不是因為其建築價值，而是建築與世界的關係。這些建築不只是防禦性的碉樓，對這條村的村民來說，碉樓是一處避難的地方。村莊、碉樓、華僑回鄉所建的學校、圖書館等，加起來才反映到碉樓的主人對家鄉及世界的貢獻。

他們不但使北美或歐洲的國家找到一大桶金，更為他們建築鐵路。不論美國或加拿大的鐵路，東西

貫通令她們的經濟發展大躍進。開平碉樓就見證了這些中國人對世界的貢獻，直至現在仍然維繫着海外五代、六代、七代的華人與家鄉的關係。

申遺成功後，我便離開了申遺辦公室。很慶幸8年的工作時間中，辦公室花了最少5年的時間用於研究上，中國其他的景點可能沒有做到。我們為每一幢碉樓安排專屬的檔案，不斷更新至今天。另一方面，開平政府花了很多金錢培訓官員，讓他們知道什麼是世界文化遺產，以及其保育的方法。因此，當我們申遺成功，他們反而不太敢開發旅遊，開平政府也從沒有做過任何宣傳廣告或商業廣告。但是，現時有些擁有強大資本勢力的公司看中碉樓，現時就有宣傳旅遊的廣告了。

C：謝謝金花，2007年申遺成功後，她沒有離開過，仍做着「倉東計劃」。她不是把外面的一套概念帶進一個地方，而是與當地人一起參與保育的工作。你怎樣融入當地的生活和文化，令他們參與文化保育的計劃？

T：2011年，我們開始了「倉東計劃」。我是教導建築遺產的老師，我以教育的角度教導他們進行文化遺產保育，從建築保護、社區凝聚、與村民合作、建立村民對文化遺產的自豪感，達到向大眾宣傳文化遺產保育的概念。

其實村民也有保育文化的意識，因此「倉東計劃」只是在有需要時提醒他們。例如，現時孫中山紀念館得以保留，全因謝家寶後人的努力。謝家寶是何甘棠的女婿，本來孫中山紀念館名為甘棠第，謝家族人出版甘棠第的紀念書，書本感動香港政府，以換地的方式才能保留孫中山紀念館。謝家寶的曾孫謝天佑是倉東計劃的成員，都很有緣份。

倉東村的村民想修理祠堂，他們便自發齊湊金錢。當謝天佑回到鄉下，看到祠堂破爛及漏水，便負擔起村民湊不夠的款項，可是他要求維修要找專業人士，不可讓村裡的人自己維修。我覺得這是最好的個案，因為村中的人已有保育意識，自發維修，更有經濟上的支援，而不是我們進村，大嚷我們要保護你們的村莊。社區參與很重要，當祠堂建好，他們要收門票開發旅遊。我便提出：開發旅遊並不是簡單的事，你要請人賣門票、搞衛生。他們花去一年時間做門票，開放旅遊，結果一年賺了3,300元，根本入不敷支。

當時他們自發來找我，我便提議他們把地方變成教育基地，培養更多市民的保育觀念。我看到香港大學建築保育學部如何壯大，便知道怎樣培養人才及改變市民對文化遺產保育的看法。因為斷不能將倉東村變成大學學系，我建議他們以教育公園的形式，安排短期參訪，目標是公眾人士，而不只學生。當我們開始營運後，才知道很多經濟來源從學生教育而來，因此我們現時名為「倉東遺產教育基地」，作為親子團、學生、政府官員、不同年齡層的人的教育基地。我們是非牟利機構，大陸的叫法是「民營非企業」，我們可以經營，收入可拿來支持項目的運作。然而，當我們要兼顧修復建築和遺產保育教育，經費永遠不夠。現時的收入只夠應付員工的工資及水電費等日常開支。

今年，我們借了很多錢，因為要改建一些建築。我欠了村民4個月的工資、裝修和冷氣費用、建築材料商的費用，我只能答應他們年底發還。

C：首先要說說金花是義務承擔「倉東計劃」，申遺也沒有被支付任何薪水。因為她教書，不能有其他收入來源。我想問一問Benny，剛才金花提到村民已有保育意識，所以事半功倍。但是，30年來香港人也不知道什麼是保育，你會覺得自己孤軍作戰嗎？你如何獲得資金營運這裡，並令你一做就30多年？

B：其實，最重要是你想做那件事，你便有機會做得好。藝穗會的空間很適合搞藝術，我們只是偶然成為一個文化遺產的保育者。得到一個地方，如何使用，同時又尊重他的故事？舉辦超過二萬個表演及四千個展覽，我們一直找尋數字的意義。意義出自在這裡做表演的人，他的藝術生命與藝穗會接連上來。前幾天做訪問，有個記者跟我說，「我對這個地方有很深的印象，因為我認識也斯，我們曾在天台把酒談天」。現正展出的展覽，藝術家劉學成也表示，他年輕時覺得，如果能在這個地方做展覽，他會很高興。數字之餘，30年、40年，對我來說是精煉而成的時刻。

說回實際情形，藝術會是一個獨立機構，仍不斷掙扎，我們只是向政府租借這個地方。一直以來，

我們見步行步，搞節目的資金也不充裕。每年4月1日，並沒有一筆錢等着我們運用，很多年的4月1日，銀行戶口差不多是零。你需要不斷做節目、活動，令自己生存，但我們又不是只想在存，還希望滿足自己、打動他人。過去30年，我們一直平衡金錢及理想，到今時今日，你知道不應該為了數字改變你做的事及原則，而是令到那時數字可以讓你做到想做的事之餘，也沒有改變你的原則。這就是高空行鋼線的難處。



主辦
Organised by



捐助機構
Funded by



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
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
同心同步同進 RIDING HIGH TOGETHER